

# 中国问题的哲学关注(笔谈)

编者按: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是时代的口号。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体现时代精神,就必须面向现实人的生活世界,关注时代性“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把“面向中国的哲学”作为总体研究方向,注重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直面并研究当今人们关注的时代性“问题”。本期分别从思维方式、公平正义、道德治理等角度切入“中国问题”的三篇文章,期望对推进“面向中国的哲学”的研究和探讨有所助益。

## 问题导向与辩证思维

韩庆祥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北京 100091)

中图分类号: B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2015)07-0001-11

自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自从全球化进程加快且西方对中国实行意识形态渗透以来,自从中央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治理以来,中国理论界、学术界出现了一种现象,就是争夺解释权和话语权兴盛,“左”“右”之争泛起。这使本来比较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更加迷雾重重。在这种情景下,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尤其是辩证思维澄清意识形态迷雾?习近平强调要树立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这对我们解决意识形态纷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和指导意义:使过于纠缠争论“导向”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聚精会神解决中国各种问题、一心一意化解中国各种矛盾。

### 一、观察思考世界的误解及其根源

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之所以出现误解,与观察思考世界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有关。

收稿日期:2015-06-02

作者简介:韩庆祥(1957—),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人与政治哲学研究。

当今,在如何看待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问题上存在的一个误解,就是西方习惯于用“民主与专制”这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看世界,其世界观是“二分法”的世界观:它们把整个世界划分为“民主政体”的世界与“专制政体”的世界,认为西方世界属于“民主政体的世界”,非西方世界(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则属于“专制政体的世界”;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是文明的、先进的,而实行专制政体的国家是愚昧的、落后的;一切非民主政体的国家都应向民主政体的国家看齐,否则,就应当受到打压、制裁。

当今,在如何看待现代化问题上存在的一个误解,就是认为全球化进程就是现代化进程,而西方方式的现代化是世界上领先的、先进的现代化;后发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学习西方方式的现代化,向西方方式的现代化看齐,以西方为中心。

当今,在如何看待意识形态问题上存在的一个纷争,就是要么认为西方所倡导的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普世价值具有普世性,当今中国也应高举西方普世价值的大旗;要么认为只有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国学可以救中国,可以解决当今

中国问题。

以上误解和纷争在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得到了集中体现。主要集中在中西方之争、“左”“右”之争上。一些人认为,西方月亮比中国圆,一切应向西方标准看齐,一切都要向西方学习;有些人认为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解决中国问题才更有效;还有些人主张,应主要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和方法分析问题,同时抵御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渗透和演变。中西方之争、“左”“右”之争,实质是争夺解释权和话语权之争。这种争论,一定意义上会影响我们对新一届中央精神的全面准确深入理解,影响我们本应坚持的正确方向,影响我们的战略定力,影响我们聚精会神、一心一意去解决矛盾和问题。

产生以上误解的一个原因,是缺乏“问题导向”和“辩证思维”,常常停留在经验层面、感觉层面和情绪层面看问题。当然,还有立场问题。由于一些人往往在经验层面、感觉层面和情绪层面看问题,缺乏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尤其是辩证思维,所以,在看待问题时,要么只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而忽视两者之间的统一,要么只看到矛盾双方的统一而忽视两者之间的对立,结果就是陷入片面性,甚至走极端。

## 二、习近平观察思考问题的哲学思维及其意义

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各种难题面前,毛泽东同志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辩证法、实践认识论和唯物史观来破解矛盾和问题,最终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从理论上首要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首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胜利。因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核心,就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1978年之初,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争论异常激烈。尤其是“领袖标准和实践标准”的争论、“姓社姓资”的争论,成为当时各种争论的核心。不澄清和解决这种争论,就会影响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用“实践标准”及“实践效果检验”来破解这种争论,恢复和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人们的争论导向坚持“三个有利于”上来,导向注重实际、实干和实效上来。“实践标准”和“思想路线”本质上是一个哲学问题。显然,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破解当时意识形态迷雾,在“破”和“立”中,在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历史发展到江泽民、胡锦涛执政时期,他们分别用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破解难题、指导实践,推动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

当今,过去发展进程中积累起来的问题、难题、矛盾堆积成山,成为难啃的硬骨头;各种深层障碍和阻力呈现,必须壮士断腕、背水一战;各种考验、挑战、风险、危险并存,应当有效应对;各种意识形态争论呈现,需要沉稳化解。在这种情况下,最需要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破解种种难题,提高解决改革发展中的各种问题的本领。习近平总书记正是这样做的。他对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高度的理性认知和深度的理论自觉,特别注重并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来观察思考世界,来分析破解矛盾、问题和难题。

其实,在党的十八大以前,习近平同志就善于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察思考问题、指导工作。在浙江任省委书记期间,他以“哲欣”笔名发表大量文章,不仅“哲欣”笔名蕴含哲学之意,而且其文章中也蕴含着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和创新思维。他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多次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强调领导干部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处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光辉,而且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集体学习。总起来说,这给我们释放出了五个重要信号:(1)习近平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提出两大核心命题,即“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和“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其实质,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自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2)要树立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即把我们的精力集中用在发现解决问题上,把解决问题作为我们推进和做好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3)要注重并自觉运用辩证思维,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来化解各种矛盾。(4)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提高我们的辩证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提

高我们分析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本领。(5)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辩证思维来澄清、化解各种错误认识,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具体来说,习近平总书记观察思考世界和问题的哲学智慧,集中或主要体现在他提出的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上。

第一,六种思维“各司其职”、各有其用、各有侧重。如前所述,历史思维,重历史过程、历史逻辑、历史必然和历史合理性,它把任何对象和事物置于历史发展过程中进行思考,注重揭示事物发展的必然进程及其内在逻辑。辩证思维,就是注重矛盾分析,抓住矛盾尤其是主要矛盾;在注重矛盾双方对立的时候不忽视两者的统一(这种统一,既可以是矛盾双方的内在统一,也可以是矛盾双方统一到双方的结合点、共同点和支点上)在注重矛盾双方统一的时候不忽视两者的对立;它注重“考察的客观性”即事物本身的本来面目,注重全面、联系和发展地看问题。系统思维,就是从整体来理解部分,把部分置于整体中思考,调整好结构,发挥最佳功能。战略思维,就是对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进行科学谋划的思维方式;它意味着时间维度上的长远考虑,跳出眼前从长远看眼前;空间维度上的全局谋划,跳出局部从全局看局部;系统维度上的整体布局,跳出部分从整体看部分;它致力于解决根本性问题,努力占据发展的制高点,进而具有战略定力。创新思维,就是对事物做全新思考,对结构做全新调整,对活动做全新谋划,力求寻求新思路,打开新局面,开创新境界,提升新水平。底线思维,就是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或者说做好防范最坏结果的准备,付出达到最好结果的努力;它意味着要树立问题意识、危机意识、效果意识和边界意识,遇事从容应对,牢牢掌握主动权。

第二,六种思维的核心是辩证思维,都源于辩证思维。辩证思维的本质是处理矛盾关系、解决问题的。辩证思维注重面对问题和矛盾,并力求发现分析解决问题和矛盾;它以尊重客观事实和客观世界为基础和前提;它注重揭示和发现事物的本质,本质即矛盾关系,矛盾关系规定本质;它注重诉诸实践,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它注重历史发展过程,认为其过程有规律可循。就辩证思维与历史思维关系而言,辩证思维要求正确处理好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的矛盾关系;就辩证思维与系统思维关系而言,辩证思维要求正确处理好部

分与整体、结构与功能的矛盾关系;就辩证思维与战略思维关系而言,辩证思维要求正确处理好目前与长远、时间与空间、局部与全局的矛盾关系;就辩证思维与创新思维关系而言,辩证思维要求正确处理好创新与守成、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矛盾关系;就辩证思维与底线思维关系而言,辩证思维要求正确处理坏与好的矛盾关系。

第三,习近平总书记注重运用辩证思维来观察思考问题、指导工作。他用辩证思维正确看待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在对待权力和权利的关系上有矛盾的一面,尤其是有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时,这种矛盾更加突出。然而,在习近平总书记心目中,更注重两者之间的统一,他强调“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他用辩证思维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道路,即他能辩证地看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道路问题上的一般与特殊、一与多、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历史规律与人民主体、效率与公平、坚持和发展等关系。他用辩证思维理解中国梦,即他在中国与世界的辩证关系,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辩证关系,个人与组织的辩证关系中理解中国梦的内涵,在“思想分化”与“最大共识”的辩证关系中理解中国梦的实质。他用辩证思维对待全面深化改革,强调在全面深化改革问题上,要辩证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处理好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的关系。处理好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胆大与心细、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部署与落实的关系。他用辩证思维提出并注重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强调“四个全面”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我们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他用辩证思维看待法治中国建设,既注重合理吸收西方的法治精神,又强调要根据中国国情推进依法治国,尤其要辩证看待党和法的统一关系,看待法治与德治的统一关系。他用辩证思维看待经济发展新常态,强调要正确处理好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辩证关系。他用辩证思维对待反腐倡廉建设,看待治标与治本的辩证关系。他用辩证思维对待意识形态建设,看待意识形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对待我们党在意识形态建设中遇到的主旋律与多样化、主流与非主流、“中”与“西”的关系。他用辩证思维看待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辩证对待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化、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和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之间的关系,辩证看待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辩证对待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他用辩证思维对待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强调在社会建设上,要辩证看待社会活力与社会和谐的关系、党政主导与社会参与的关系。他用辩证思维对待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强调要处理好“伟大事业”与“伟大工程”之间的辩证关系。他用辩证思维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强调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注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习近平总书记运用辩证思维看待各种各样问题,不仅澄清了人们思想认识上的种种迷误,而且有利于他科学判断现实、认清形势、正确决策、指导实践,有助于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应对挑战和做好工作。

### 三、运用辩证思维观察思考问题并澄清思想迷误

从习近平观察思考问题的哲学思维及其效果中,我们可以获得诸多有益启示。总起来说,它要求我们坚持问题导向,善于自觉运用辩证思维观察思考问题,澄清思想认识迷误,避免片面性和走极端,正确化解矛盾,提高解决问题的本领。

第一,辩证思维内在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力戒无谓之争。习近平三番五次强调要倡导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这对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导向。这种导向对正确对待当今中国的“中西之争”、“左”“右”之争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这就是:当今应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的研究路线,树立问题导向,合理跳出“中”与“西”、“左”与“右”的过度纠缠、过度之争,把人们对“左”和“右”、“中”与“西”的过度关注引向对“重大问题”的关注分析解决上来,把人们的精力和有用的思想资源引导到破解中国现实问题上来,抓住一些关键性、命运性问题进行思考研究。要言之,可少谈些“左右”,多谈些问题,用“解决问题的成效”扬弃某些无谓的“左右之争”,判断“左右之争”的意义。

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其思想精髓、核心要义之一,就是要强化“问题意识”,“积极化解矛盾”。他说,要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

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我们提出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新年伊始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意味深长,它旨在让各级领导干部掌握辩证思维,提高辩证思维能力,提高解决改革发展问题的本领,为在实践上做好“四个全面”提供思想准备。这一思想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在笔者看来,习近平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首先面向中国问题,注重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又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唯物辩证法,应增强我们的担当意识,敢于直面并破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提高化解矛盾的本领,注重增强实践本领的哲学;也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唯物辩证法,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善于把主要精力用在发现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上来,注重化解矛盾的哲学;还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唯物辩证法,可以提升我们的辩证思维能力,从而可使我们既抓住重点,又避免片面性和走极端,注重辩证思维的哲学。

第二,辩证思维内在要求全面看问题,力戒片面看问题。辩证思维力求从两面性看问题,避免片面性和走极端。当前,“去中国化”的“西化”派往往只看到西方先进文明的一面,看不到西方落后、阴暗的一面,只看到中国落后、阴暗的一面,看不到中国进步、先进文明的一面;而某些“去西化”的人则贬低西方、高抬中国,看不到我们落后的一面和西方先进的一面。还有,“左”派人士对“西方”的拒斥与“右”派人士对“西方”的崇拜,都是只看到问题的一方而忽视问题的另一方。这在一定意义上都是走极端和片面化、违背辩证思维的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辩证思维,是化解纷争、矛盾和冲突的关键一招。因为辩证思维要求从两面性看问题,在注重矛盾双方对立的时候不要忽视两者之间的统一,在注重矛盾双方统一的时候不要忽视两者之间的对立。这既有利于澄明意识形态迷误,也有利于正确化解矛盾和冲突。

第三,辩证思维内在要求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看问题,力戒从原则、理念、书本公式出发看问题。辩证思维首先注重考察事物的客观性或事物的本来面目,即要求从事物的客观实际出发看问题,而不是从原则、理念、书本公式出发看问题。这对正确理解我们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至关重要。然而,有些人往往从原则、理念、书本公式出发看问题,而不是从中国“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出发看问题,把

“原则、理念、书本公式”当作评判中国现实的标准,结果这也看不惯,那也很落后,对现实社会产生不满。

第四 辩证思维内在要求理性地看问题,力戒情绪化看问题。辩证法是一种高级理性,它是“讲理”的而非情绪化的思维,只有具有高级理性的人,才有可能掌握辩证法和辩证思维。因此,辩证思维不是经验思维,而是一种高级理性思维。它既要求不断增强我们的科学判断能力,又要理性地面对各种纷争或意识形态争论。今天,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之所以出现一些带有偏见的、情绪化的甚至是打棍子的无谓争论,既与缺乏理性思维有关,也与缺乏科学判断力有关。

第五 辩证思维内在要求我们科学对待西方社会思潮,力戒丧失国家和民族的主体性。究竟如何看待西方社会思潮?这是学术界争论很大的一个问题。一些人对西方社会思潮崇拜得五体投地,而有些人把西方社会思潮贬低得一无是处。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如何看待普世价值和宪政上。一些人认为,普世价值和宪政绝对是个好东西,在中国必须讲普世价值和宪政,不讲,就是拒斥世界文明,甘愿愚昧落后。另一些人认为,普世价值和宪政是一种陷阱,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是西方中心论的体现,是西方对非西方国家实行和平演变和“攻心战”的一种攻心术,是西方打压、制裁非西方国家的一种手段。这里着重谈普世价值。如果我们运用辩证思维看待普世价值,就能真正识别普世价值的本质和实质。应当承认,普世价值中确实具有供我们可吸收的文明有益因素,比如对自由、平等、法治的强调和注重。对此,作为学习型大国,我们应以开放、包容的胸襟学习世界一切国家的一切文明有益成果。然而也应清醒看到,普世价值确实也有值得我们讨论的地方。

一是它混淆了价值与价值观、普世性与普适性的根本区别,用价值、普世性掩盖价值观、普适性。如前所述,价值具有普世性,而价值观不具有普适性。从字义表面来讲,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都是价值,而不是价值观。价值观是对“价值”具有方向性和取向性的根本判断、根本看法。它们的策略是,首先让你接受这些价值(一般来说,大多数人是会接受而不会拒绝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合理吸收了其中一些“价值”),然后再给出他们的定义、解释和看法,这就是价值观。他们向你灌输的是他们的价值观,而不是价值。再加上他们掌握着话语权,一些人就会掉入他们设置的圈套。我们所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

“12个词”作为价值,不分国家、民族、社会和人,大都会认同。这是具有普世性的。正如都认同“都要穿鞋”一样。但作为价值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及其各自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这“12个词”就有不同的定义、解释、判断和看法。比如对自由、民主、公正等,就有各自不同的解释和理解。当然,在解释和理解中也会具有某些共同点,但差异甚至根本差异是存在的。正如都认同穿鞋,但一定有“合脚不合脚”的感觉一样。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鞋子论”,就很有启发性。西方人推崇“选举”民主,一人一票,而中国倡导“协商”民主,有事与人民商量;西方文化推崇个人自由,而中国文化倡导在“社会关系”中的自由。就这个意义上,价值观是不具有普适性的。

二是它混淆了特殊与普遍的区别,把“特殊”说成“普遍”,再用“普遍”掩盖“特殊”,用所谓“普世价值”掩盖“国家利益”。既然西方对“普世价值”给出的是自己特殊的解释,而不是能给全人类带来真正利益和共同和谐发展的普适性解释,那么,不管你怎样辩解“普世价值”的普适性,也掩盖不了其特殊性的本质。但西方的策略是,想方设法把其“特殊”说成“普遍”,用“普遍”遮蔽“特殊”,用所谓普世价值掩盖“至上的国家利益”。西方给出的“自由观”“民主观”是他们的“自由观”“民主观”,而不是其他国家所都能认同和接受的“自由观”“民主观”。因为其他国家虽然也需要自由和民主,但对自由和民主需求的内容、方式、程度、进度大不一样。用所谓普世性掩盖“国家利益”,或者是以本国的国家利益至上为本质和目的的“普世价值”,不管你说得多么“普世”和“动听”,它一定不具有“普适性”。美国说自己坚持和奉行的价值是“普世价值”,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美国国家利益至上。他在对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时,总是把美国国家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把“普世价值”只是作为幌子。应当承认,在公民个人层面,西方国家所讲所奉行的普世价值是较为真诚、现实的。然而,在国家之间的国际实践层面,却不那么真诚。这里,他们在国家之间的实际行动上多奉行的是国家利益至上(这种国家利益至上,是会牺牲他国利益的),而不是普世价值。或者说,他们往往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却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换取本国利益的发展。比如,在面对西亚、北非、中东国家的政治动荡时,美国对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巴林、也门等所采取的政策,就自相矛盾。小布什政府以指责“无赖国家”、“邪恶轴心”伊拉克

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构成了对人类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威胁为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多年过去了,人们越来越透过表象看清其实质,这场战争的真实动因,就是美国为了夺取对中东和巴尔干的主导地位,维护自身在该地区的霸权,以获取巨大的军事战略利益和地区资源利益。讲到这里,我们就大致明白了:美国之所以搞所谓“普世价值”那一套,就是因为它想借其硬实力和软实力上的话语权,在整个世界推行他们主导的一元价值观,排斥和压制世界各国的多样价值观,为其干预、制裁其他国家提供所谓“合法性”的根据,以维护其世界霸权、霸主、中心的地位。要言之,他们是用所谓具有普世外衣的自由、民主等而真正行使对其他国家的专制,用其文化软实力谋取全球霸权,为其霸权主义行为披上合法外衣。

三是它所讲的普世价值是具有选择性的价值,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世性价值。作为确立“普世价值”主体的人在确立普世价值的时候,都会具有选择性。问题是:你既然将其确立的价值称其为“普世”价值,你就应该把世界各国文明有益成果的精华合理吸收进去。比如,作为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文化层面,确实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过贡献,其所讲的“仁义礼智信”“实事求是”“协和万邦”“世界大同”“合作共赢”等,应当说属于人类文明有益成果,也具有他们所谓的“普世性”,因而应合理吸收进去。但为什么在他们所谓普世价值的谱系里,只有他们所讲的自由、民主,而没有“仁义礼智信”“实事求是”“协和万邦”“世界大同”“合作共赢”呢?显然,这种具有选择性的普世价值“观”是难以真正得到整个世界普遍认同的。有专家向我们提供这样一个事实:西方有的政要就怀疑向发展中国家推销“普世价值”的“合法性”。如法国前外长韦德里纳与法国国际和战略关系研究所所长博尼法斯在《全球地图册》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韦德里纳说“我一直坚信和捍卫这些价值,但我不无伤感地告诉您,西方世界10亿人口在全球60亿人口中占少数,我们认定的‘普世价值’未必真的就是‘普世’的,现在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价值观。”

四是在立场和动机上,它既借口当今中国实现他们心目中的“自由、民主、法治”的条件不健全,又鼓励和支持民粹主义,来对中国打“攻心战”,以制造民众与党和政府的对立,试图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78年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以开放的胸襟

和实际眼光,强调并注重学习西方发达国家一些先进文明的有益成果。同时,一些西方国家却试图“对我国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一点,邓小平同志对我们是有所提醒的。有的专家指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深谙意识形态之道,因而在冷战时期将意识形态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1953年,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首次提出“和平演变”概念。和平演变战略涉及方方面面,其中之一就是“攻心战略”,即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文化渗透、诱导、催化,以瓦解中国人的精神斗志和凝聚力。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指出:必须动用我们的军事、经济和技术力量以及手段,诱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开展“意识形态斗争”,打“攻心战”,扩散“自由和民主价值观”。当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不再相信他们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的时候,就是美国人不战而胜的时候!美国这种攻心战(攻略或攻心术)是通过五个步骤来实现的:第一个步骤,按照两极对立思维,把整个世界划分为“文明与不文明”“民主与专制”两类世界。他们认为,西方世界是注重民主的文明世界,非西方世界是属于专制的不文明世界,西方世界是整个世界的中心,非西方世界应走西方世界的发展道路。第二个步骤,让中国人崇拜“西方标准”,向西方基准看齐。第三个步骤,用“西方标准”裁判中国,让中国人自己认为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第四个步骤,让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对自己的国家、民族、人民,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采取虚无主义,统统给以否定,抹黑中国,釜底抽薪。同时,一些西方国家再进一步丑化中国、美化西方。第五个步骤就是“不战而胜”:对“中国人”来讲,就是要动摇中国人的理想信念,摧毁中国人的自信,瓦解中国人的共识,离间中国人的凝聚力,消磨中国人的斗志。一句话,造成我们一些中国人的精神懈怠;对“党和国家”来说,就是要消解整个主流意识形态,摧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可是,当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心斗’的时候,中国一些人却安于现状,缺乏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对西方一些国家的‘心斗’无动于衷。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运用辩证思维分析普世价值,目的在于提高我们的辩证思维能力和化解各种思想认识迷雾的本领,而不是拒绝学习西方发达国家一切文明有益的成果。中国是一个学习型大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政党。然而,当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要明确两种不同的“学习观”:一种是“吃了牛肉把人变成牛”的丧失

国家、民族主体性的依附性学习观;另一种是“吃了牛肉比牛更牛”的强筋固体且增强国家、民族主体性的学习观。我们应倡导的是第二种学习观,不是第一种学习观。

此外,辩证思维内在要求历史地看问题,力戒以主观愿望来看问题。习近平访欧期间发表系列讲话,其中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要从历史的中国深入认识现实的中国。这一思想的实质在于:既要认识到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改革,所开创的“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以及

所要实现的中国梦,当今中国所取得的历史进步等,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历史根据)和历史合理性,都是由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决定的;也要认识到今天中国现实中存在的问题都有过去的历史根源。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然而,有些人要么用“西方标准”裁判中国,要么用“主观标准”(从主观愿望出发)评价中国现实,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合法性”提出种种质疑,结果得出一些偏颇的结论。对此,必须进行严肃的理论批判。

# 政治哲学与促进公平正义

杨玉成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北京 100091)

## 一、政治哲学认识和处理公平正义的理论框架

从字面上看,所谓政治哲学就是以政治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政治的要素包括政治制度、政治人物和政治行为。政治哲学主要以政治中最稳定的要素即政治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从人类历史上看,国家是最重要的政治制度,所以政治哲学集中研究国家制度。在西文中,“政治”这个词就脱胎于古希腊文的“城邦”或“国家”,因此从词源上看,政治哲学也就是关于国家的哲学,即以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当然,政治哲学对国家的研究不同于政治学对国家的结构及其运行所做的经验研究,而主要是阐述和讨论用于评价国家制度的道德标准。在西方政治哲学中,正义、自由、平等、民主都属于对政治制度进行评价的道德范畴,其中正义经常被看作是首要范畴。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情况也类似。儒家经典《论语》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sup>[1]</sup>这句名言代表着儒家对“政”的理解。政就是“正”,就是要“帅之以正”“正己而

正人”。当然,儒家重视的是“为政者”的道德品质之“正”,如果我们按照偏重制度正义的现代观念,从“为政者”个人品质延伸到国家或社会制度的品质,那么,所谓“政治”也就是以“正”施治,即以正义为基本原则来进行国家治理。

什么是正义?当我们把正义作为国家或社会的品质时,指的是国家或社会恰当地对待它的每一个成员,给每个成员以“应得”之物——给每个成员提供相应的职位和报酬等,同时也要求每个成员承担相应的职责或义务。但是,对于“应得”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同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各种不同的正义观。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等级论正义观、权利论正义观、功利论正义观、社群主义正义观和公平正义观等。可见,公平正义观只是各种不同的正义观中的一种。“公平正义”的意思是“公平的正义”或“以强调公平为特征的正义”,其中“公平”是修饰“正义”的。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把公平和正义并列。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去掉“公平和正义”中间的“和”字,正式使用“公平正义”概念。此后中央文件用的都是“公平正义”。“公平正义”中间有没有一个“和”字,意思大不一样,表明我们党所追求的正义是公平的正义,而不是别的什么正义。这一字之差,实际上体现的是我党对公平和正义

收稿日期:2015-06-02

基金项目:中共中央党校2014年度校级科研一般项目“新自由主义与国际金融危机关系研究”

作者简介:杨玉成(1969—),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政治哲学研究。